

編書人的話

在旧社会地主老財拿着印把子，騎在咱們貧农、下中农和广大劳动人民头上敲榨勒索，为非作歹，无恶不做，不让咱們活下去。看看这本书里所写的胡延年、郑子和的家史吧。这两家人都是咱们的階級兄弟，他們在旧社会被逼上了絕路。成年累月給地主干活，累死累活，連糠糠菜菜也吃不上，还得卖儿卖女，挨門要飯。那些橫行霸道的階級敌人，乘人之危，下了毒手。胡延年他娘，郑子和他爹，都叫地主豺狼們給活活打死了。他們的姐妹被迫卖給人家，自己流浪街头，害得家破人亡，骨肉分离，真是苦大仇深，血泪盈盈。

这种苦是什么苦？是階級苦。这种仇是什么仇？是階級仇。在旧社会，咱們貧农、下中农，誰也受过階級压迫和階級剝削的苦。咱們是一条苦根上长的苦藤，命运相同，血肉相連。咱們一定要永远記住这階級压迫、剝削的痛苦和血泪仇。

旧社会是貧农、下中农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苦海。劳动人民的千年仇、万年恨，只是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領導，团結起来鬧革命，推翻了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統治，夺回了印把子，才有了出头之日，做了

国家的主人。咱们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，在经济上也翻了身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。咱们人民公社的日子越过越兴旺，生活也一步一步地好起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并不死心，他们时刻幻想复辟，为了保卫我们的好生活，我们一定要抓牢我们的印把子。

我们编这本家史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永远不忘阶级苦，永远不忘阶级斗争。想想万恶的旧社会，看看今天的新社会，新、旧对比，真是两个世道，两种世界呀！我们恨旧社会，爱新社会，就要牢牢地记住党和毛主席的教导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争当建设社会主义、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硬汉子和红旗手。

一九六五年二月

目 录

从流浪儿到大学生·····	1
童年血泪·····	33

从流浪儿到大学生

胡延年

解放后，党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，分配我在大学作助教，后又调我到报社作记者。每当想起我能够幸福地为人们服务的时候，不知怎的，我总是鼻子尖一酸，回忆起解放前一家人骨肉分离，逃荒要饭，到处流浪的童年生活来。

卖了姐姐

我是河北省邱县马头村人。打我记事起，我家就租种地主胡金星的地，有时候我爹还给胡家当长工。那时租子重，工钱低，在地主残酷剥削下，我全家七八口人，实在难熬。

一九四三年，春天大旱，头一年冬天没有下一点雪，地都干得裂了缝。这年春天我家未见一颗粮食粒，野菜没出地皮就被挖光了。后来俺家就吃白水煮榆叶，有时拌一点榆皮面。榆叶、榆皮吃光了，就吃柳叶、桑叶。桑叶有毒，我们一家人都吃得全身肿了，脚肿得穿不上鞋。我娘最劳苦，肿得最厉

害，脚上直流黄水。后来，树上的桑叶也吃光了，餓得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娘就把枕头里装了多少年的荞麦皮倒出来，用小磨拐了拐，用水煮一煮吃。吃下去拉不下屎来，我娘就用钥匙伸到我肛門里一点一点往外掏。我二弟拉不下屎来，憋得肚子疼，我娘就用火罐子烤，烤时把肚皮上烧伤一大块，至今还落了个疤。最可怜的是我不滿两岁的小弟弟，肛門小没法掏，被活活憋死了。

我爹媽看着我姐弟們快要被餓死，忍着心疼要把我两个姐姐卖到西乡去。那时我大姐十六岁，二姐十四岁。哪个当爹娘的不疼孩子，哪个当閨女的不疼爹娘啊！我爹难过得一夜沒睡觉，我媽哭得死去活来，两个姐姐一夜哭湿了两个枕头。第二天天还没明，爹就拉着两个姐姐往西乡（鸡澤县）去了。我和媽媽送了五六里路还舍不得分手。临别，我媽往我两个姐姐衣袋里各装了一块家乡的黑土坷垃，哭着說：“甭說当娘的对不起你，是咱家穷。到了外乡，想起家就看看家乡的黑土，定定心。”姐姐和娘都哭湿了衣襟。

我怎舍得叫姐姐走啊！我小时候姐姐經常抱着我，长大了又一块挖野菜。有时到远地方挖野菜，中午回不来，姐姐往衣兜里装一块糠菜糊糊，掰給

我一大块，她自己吃小块。有时地主羔子打我，姐姐总是握紧拳头保护我。现在姐姐就要卖到外乡，我心里多么难过啊！我拉着姐姐的衣角哭闹着不叫走，可是不卖掉姐姐又怎么能救活全家的命呢！姐姐终于从小道上往西走了，走几步一回头。我看着姐姐的背影哭着，喊着；看不见了，我往前跑几步，跌倒了，鞋掉了，我一看鞋，这鞋还是姐姐给我做的呀！

那还是春天里，一次我跟姐姐去野地里挖野菜，我的鞋破了露出脚趾头，一不小心踏在蒺藜上，扎得我火辣辣地疼，我哭了。姐姐跑过来抱住我，帮我拔出蒺藜，还哄着我說：“小四（我的小名）甭哭了，等姐姐给你做双新鞋，蒺藜就不扎你了。”当天夜里在棉油灯下，俺娘和大姐给我纳鞋底，二姐给我纳鞋帮，忙着给我做鞋。我一心想穿新鞋，翻来复去睡不着，瞪着小圆眼对姐姐說：

“姐姐给我做双脸盆子鞋吧！”姐姐說：“嗯！你放心睡吧！明早准叫你穿上新鞋。”第二天清早，我还没睁开眼，姐姐就叫醒我，叫我試新鞋。我一試，不大不小正好合脚，我喜欢得抿着嘴笑。想到这里，再看看手里的鞋，更加想念姐姐了。当我再抬头看姐姐时，已经走远看不见了。我拿着鞋，打着

滾哭……

餓死了娘

爹領着姐姐走后，俺娘儿几个，把家里的一点破烂东西换了几斤高粱壳吃，忍飢挨餓熬到了麦收。一天我和弟弟跟着娘去地里拾麦，娘儿仨撿了半天才撿了一把麦。天黑时，忽然发现地头有割剩下的几棵青麦子，我和弟弟高兴地跑去采。誰知恰在这时候，地主家三少爷胡丙全来了，見我篮里有麦头，硬說是偷他的，上前打了我一巴掌，伸手夺过我的篮子，气势汹汹地摔在地上，三脚两脚踏得粉碎。他打了我，凶气还未消，又来打我弟弟。这时我气极了，想和他拚命。当他又去掐我弟弟脖子时，我抓过他的手就咬，地主羔子心真狠，一脚把我踢倒，下巴颏扎到麦茬上，鮮血直流（如今我下巴颏上这块疤就是那次留下的）。狼羔子还想按着我狠打，我娘急忙抢上去挡住我，跪在地上哀求：“三少爷，行行好吧，饒过孩子这一回吧！”狼哪懂得人性，見我娘挡住他，沒打在我身上，早气紅了眼，上前一把扯下我娘腰間的围裙，嗤嗤撕成了布条条；俺娘伸手夺围裙肘，他飞起一脚把我娘踢得半天起不来。我娘早瘦成了一把骨头架子，加



上一天水米沒进，走路还直心慌，哪里还能經得狼羔子这一脚，当时就吐了口鮮血，晕了过去。我和弟弟趴在娘身上呼喚了半天，娘才睜开了眼。可是她在地上躺着不能說話。我和弟弟把她架回家去。到家就得了病，发高烧，上吐下泻，鬧騰了一夜，天明眼窝塌下去一指多深，眼圈也黑了，还直咬牙翻白眼。眼看着我娘一天也难活下去了，这时我多么盼着我爹回来呀！爹卖了姐姐，也許能帶点粮食回来，好救活娘的命。

爹回来了，一粒粮食也沒帶回来，脚上的鞋也沒了，光着脚丫子，身上穿的破褂子也不見了，披着破布袋片。原来，爹把二姐卖给任县一个人家当童养媳，又通过人贩子把大姐姐卖给山西，换来二斗紅高粱。回来时路过龙堂鬼子炮楼，炮楼里的伪軍說我爹是八路軍，把二斗高粱抢走了，破褂子也被剝去了，还毒打了爹一頓。——我娘听完爹的述說，气得一口气沒上来，就閉上了眼。我爹伤心过甚，哭不出声来，躺在炕上直打滾。我早哭得嗓子变了声。

我哭着把娘被打的經過告訴爹爹。爹是个倔强的人。从前就因为地主逼死我爷爷，跟地主拚过命。从那时起，俺家和地主胡金星家結下了冤仇。

我爹为了抵抗地主的人身压迫，练成了一身好拳脚。一次，爹正在井台上担水，见两个地主羔子欺负我，爹就抡起扁担当三节棍打地主羔子，两个地主羔子回家拿了两把砍刀也没打过爹爹。这时我娘又因被地主殴打致死，爹气得两眼通红，从门后边拿起一把镢头对我说：“孩子！咱反正活不成了，他们逼死咱家两条人命了，我要跟他们拚了！你们记住你爷爷、你娘、你爹是怎么死的，长大了要报这份血仇！”说完，跳起来就要往外走。我兄妹三人也顾不得哭了，抱住爹的大腿死活不让爹走。爹看着我们兄妹三人都很小（数我大，我才十岁）留下无人照管，又看我娘还躺在炕上没人料理，手腕子一软，镢头落在地上，捶胸顿足大哭起来。爹对我们说：“日后只要咱家还有一个人活着就要讨回这笔血债！咱穷人不会穷一辈子，日后总有个出头露面、报仇雪恨的日子。”

用炕上的破席将娘好歹地埋了，埋完回来，爹闷坐在空炕上低着头发愁。弟弟妹妹抱着爹的胳膊腿，哭鬧着向爹要娘。我边哭边在炕上收拾娘生前留下来的破烂东西。在娘生前用过的针线筐子里，拿出娘生前穿的一件褪了色的浅蓝褂子，上面足足补得有二三十块补丁，有黑的有白的，啥色都有。

看到这些更想起了娘。娘啊！你一生沒穿过一件沒补釘的衣裳，你一生沒吃过一頓不掺糠菜的飯，你似牛似馬，受苦受难，临死用块破席头把你卷。在娘的破蓝褂子的肩膀上，有块沒有补上的白补釘，上面还連着針綫。我小心地取下这块白补釘，一針一針地縫在我的双臉鏟子鞋上，算是給娘穿的白色孝鞋。穿上这双鞋，我永远記住階級仇恨，永远不忘階級斗争！

又卖了弟弟妹妹

娘死后家中沒有一顆粮食了，再呆在家里全家就要被餓死，因此爹要領我們兄妹去到姐姐家逃活命。但这时家中連一頓吃的也沒有了，全家人的肚子都餓得咕咕叫，这怎么能走到姐姐家呢！不走吧，再晚两天，說不定就逃不出去了。怎么办呢？爹咬了咬牙說，卖地！

哪有什么地可卖呢？爹忍着心含着眼泪，只好把大路边上的二亩七分已經当出去的活契地变成死契。灾年是富人发橫財的时候，也是穷人傾家蕩产的时候，二亩七分地根仅卖了十元鈔票。灾荒年东西不值錢，只有粮食是宝，粮价高昂，十元鈔票只买回四斤高粱十斤糠。爹用小磨拐了拐，蒸了一鍋

糠窝窝头，算是一路上的盘费。

黎明，我爹挑着两个破筐，一头挑着三岁的妹妹小鱼，一头挑着六岁的二弟。我才十岁，拄着个打狗棍，一瘸一拐地紧跟在后边。我们父子四人忍着饿，累死累活，走了两天半才来到鸡泽县柳夏村姐姐家。满想快赶到姐姐家吃顿饱饭，可是临近村边，爹不让走了。他嘱咐我们说：“见了你姐姐谁也不许说你娘死了。”爹叫我把脚上为娘穿孝的两只白鞋脱下来，藏在筐里，怕姐姐看见了难过。

到了姐姐家，姐姐的婆婆正在院里闲坐着，看到我们进来连理也不理，一拧鼻子朝屋里走了。姐姐正在厨房里往锅里添水做饭，见我们来了，丢下手里的活，扑了过来。闺女是最疼娘、想娘的，姐姐见了我们就问娘来了没有。我想对姐姐说，又不敢说，只是哇一声哭了。姐姐惊慌地抱住我，摇着我的头说：“快说，弟弟，是怎么回事？咱娘——”我越哭越痛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姐姐又去筐里抱妹妹，在筐里发现两只白鞋，她眼一楞神，一口气憋了一大会，才倒在地上……

姐姐的婆婆一听哭叫，从屋里蹦出来，一跳三尺高，两手拍着大腿骂我姐姐：“娶了你这个小死妮，结了你这门穷亲戚，是个填不满的冤家坑，刚

背走二斗高粱又挑来四张口，俺养活不起你，快把二斗高粱退回来，给我滚出去！”

姐姐没有办法，只得领着我們父子住到村东头的破庙里。天黑了，姐姐怕回去晚了挨打，就含着泪离开我們回婆婆家去了。

在这里，爹想找点零活做，挣几个窝窝头吃，可是，灾年穷人越多，地主盘剥得就越厉害，零活也越难找。

又过了几天，还是找不到活做，要不到饭吃，看来在这里是活不下去了。爹想来想去，又把我們挑到任县俺二姑家。二姑是光緒二十六年家乡闹灾荒，地主逼租逼债逼得没法活了，俺爷爷把俺二姑背到任县桥头村，卖给徐家作童养媳的，那时二姑才五岁。到了二姑家，心想亲侄子来了，二姑准叫吃顿饱饭，谁知道二姑家也是穷人，这里是半荒年，二姑父刚饿死两天，家里沒有一粒粮。二姑含着眼泪迎亲人，忍着心把院里一棵小枣树上的枣，刚长到象鈕扣那么大，就给我们打下来，煮煮吃了两顿。吃完了大家都瞪着眼饿着。

爹爹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一办法，还是把弟弟妹妹给了人家，叫孩子逃个活命吧！可是在那人吃人的年月里，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罪，誰还要孩子呢！

找了好几天主，都沒人要。后来我爹想了个办法，把弟弟妹妹丢在三岔路口上，兴許能遇上个好心人收留起来。白天放在路口，晚上抱回来，弟妹二人在路口丢了好几天也沒人过問，爹忍心不下，又把孩子抱了回来。

后来，爹叫二姑托人找来个人贩子。人贩子叫老多，騎着头小毛驴，见我妹妹、弟弟都餓成半死不活的，怕不好找主，賺不了錢，不愿意要。他說我弟弟腿瘸，妹妹傻，其实弟弟并不瘸，妹妹也不傻，这都是餓的呀！后来爹給人家磕头哀求，人家才勉强收下。

临走时，人贩子用两块綠豆面窝窝头把弟弟妹妹哄到驴背上。还用紅单子蒙住头，怕孩子認清路偷跑回来，那时妹妹才三岁，又餓坏了，抓住窝窝头只顾吃，她怎么知道这一別就是永別！弟弟那时六岁了，懂事了，他拿着窝窝头舍不得吃，走出十几步远，又从驴背上滾下来，跑到我跟前，硬把窝头塞給我，抱住我痛哭。我给弟弟說：“記住，你是河北省邱县馬头村人，日后可別忘了家；在路上还要教給妹妹，让她也記住咱老家的地址……”还没等我把話說完，人贩子跑过来抱住弟弟就走。弟弟在人贩子怀里拚命掙扎，哭着喊爹，喊哥哥。他被

放在驴背上，紅单蒙住了头，弟弟用劲扯掉头上的紅单子，大声喊哥哥。我也喊着弟弟、妹妹。驴跑得很快，一会，听不到哭声，又一会，连弟弟妹妹的影子也看不见了。我趴在地上大哭，手里还拿着弟弟給我的半块綠豆面窝窝头。

从此再也沒見到妹妹。二十年后才和弟弟見了面。

爹 爹 病 倒

至此，一家人只剩下我和爹爹了。爹对我說：

“今后咱爷儿俩死就死在一起，活就在一块，再不分开了。靠着我这身力气，吃点苦，受点累，养活着你。”其实，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在那剝削階級吃人的世道里，自身还不能保，哪还能顾上儿女！父子俩又在破庙里住了半个来月，还是短工活不好找，要飯沒人給，即使偶尔能找上个短工活，地主只管吃，不給工錢，吃也不叫吃飽。爹有时只吃半飽省下半个窝头，悄悄装在衣兜里，带回来給我吃。我餓得沒法，有时到地主枣树下拾个烂枣吃。烂枣也得偷拾，被地主逮住是要挨一頓打的。就这样，我餓得脫了人相，爹餓得也沒力气干活了。到了夏历七月初，高粱秀出了穗，有的晒紅米了，爹說：“这

会儿咱家乡也快到秋天了，在外乡人生地不熟，活不好找，回到家，有三亲两友，街坊邻居，熟人多，兴许还能找个活干，保住咱俩活命。”

夏历七月初我和爹又回到了故乡邱县。到了家，三间破南屋，门窗被人给劈着烧了，院子里长满了野草，兔子都跑到家里来了。我们父子俩拔了几捆草堵住窗户，砍了一捆酸柳，编了个柴门，就住了下来。地主胡金星见我们父子回来了，要我爹给他干活，俺家跟他有仇，爹很倔强，宁愿饿死也不给他干活。地主胡金星就使坏点，串通村里其他地主，不叫他们雇俺的工，想把俺爷俩饿死。爹说：

“天下无绝人之路，我不相信咱穷人离开地主就不能活！没人雇咱，咱就挖野菜吃。”幸好那年麦后下了几场雨，野菜长得很旺。我和爹，每天到地里挖野菜煮着吃。象猪毛菜、刺刺菜、马耳菜、大麻衣、苦燕尾等十几种野菜都吃过。有时也偶尔在野地里摘几个野瓜吃。后来谷子高粱快熟时，就到野地里采野谷吃。

一九四三年，这一年春天大旱，到了夏天就下起连阴雨来。从六月末一直下到八月十五，整整下了四十八天大雨。下得房倒屋塌沟满壕平。穷人由于被地主剥削得无衣无食，屋漏地潮，就生起杂病

来。症状是上吐下泻，当时人们说是霍乱病。得上病很快就死，村上一天就抬出去七八个死人。后来人死的越来越多，也没人抬了。死在屋里，屋子就变成了坟墓，一家子一家子的全家死光死绝。有个叫馬福太的贫农全家六口人，爷爷、奶奶、爹、哥哥都死在屋里，他和他娘把屋门一锁逃荒走了，等瘟疫过后，四个人的骨头还在屋里搭着。

就在这时，一天夜里，我爹得了霍乱病，上吐下泻，抽筋痛得打滚，喊哎呀！闹腾了半夜，浑身发紫，眼窝都塌下去了，眼看父亲不行了。富人家得了病请来医生，吃几天好东西养养，可是穷人哪里有钱请医生呢？这时屋外下着瓢泼大雨，俺家这样穷，天又下这么大的雨，根本请不来医生。爹知道他自己不行了，把我叫到他身边说：“孩子！我是不容易把你拉扯大。保住咱穷人的这根独苗苗，日后有个报仇人。日后你咬着牙也要活下去。记住咱和地主胡金星家有三代血仇，只要有口气就要报仇。”没等爹说完，我伤心得趴在爹身上痛哭起来，爹也哽咽得哭不出来。爹又说：“孩子，我出了一辈子牛力，吃了一辈子猪食，临死时你就不叫我吃口东西呀！”可是叫爹吃啥呀！锅里有一半锅野菜，炕上放着象碗口大一个小野西瓜。爹说你就把那个西瓜

打开叫我吃几口吧！我想爹正上吐下泻，天气又潮，吃西瓜，死得更快。我不愿叫爹吃。爹非吃不可。我无奈何只得打开切下象木梳背那么一小块给爹吃。爹哭了说：“我临死你连口西瓜也舍不得叫我吃！”我哭着说：“我不是不愿叫你吃，我怕你吃了死得快，我看不见你了。”我和爹哭在一起。后来我想，反正爹也活不成了，吃就吃了吧！怀着这样的心情把西瓜打开给爹吃。说也怪，吃了西瓜，又扎了几针，爹的病慢慢好起来了。

不能等着饿死

到了冬天，我们就采菜籽、草籽吃。爹是个泥瓦匠，有时给富人家盘火炕、盘炉灶，挣点稀汤剩饭吃。进了腊月连下了几场大雪，特别是腊月二十以后那一场，一连下了四天，下了一尺多深，门口房角处足有半人多深，甭说下地采草籽，连门也出不去。我们父子俩饿了好几天没吃饭。

我家和西院二大伯家本来只隔一垛墙，下雨时墙倒了，两家就变成一家了。在二大伯胡自强家两间小西屋里住着一夥穷人，有二大伯和他的三个儿子（大搭拉哥、二搭拉哥、三搭拉哥），还有我罗头和尚爷（因为给地主扛了一辈子长活，连个家也

沒成上，故叫和尚），還有鄰居張里相——他們都是地主胡金星的長工和佃戶。因為冬天沒活干，年景又不好，被地主趕出來。他們沒吃，沒穿，連床被子也沒有，幾個人擠在一個涼炕上睡覺。平時出門還能要点吃的，下雪後一連在家餓了好幾天了，到大年除夕了還餓着肚子，看來年關也難熬過去了。

大年初一的早晨，張里相餓死了，身子半躺着，可是手裏還拿着雪蛋子，好象朝嘴里放的样子。大概是夜里肚子餓得受不了到院裏抓了一把雪，沒填到嘴里，就死過去了。又過了幾天，二大伯也烤着火，蹲着死過去了。開始我們還以為他眯縫着眼睡着了呢，一動他倒了，才知道死了。我們也沒勁埋他倆，就抬到破房框子里，身上蓋点爛秫秸，用雪埋了埋。

在地主逼得我們走投無路時，我們大家商議，晚上趁地主不防備，準備搶地主的糧食。我們都是地主胡金星家的長工和佃戶，庄稼是我們種的。糧食是我們給他扛進倉裏去的。知道糧食在地主後大院一座破瓦房裏放着。但是當時還有雪怕地主尋腳印追，就想着等雪化了去搶糧。一天夜里我們跳過牆去，撬開窗台下几塊磚，鑽進屋裏，扛了几斗高

梁，我們大家煮煮吃了。

后来地主发现粮食少了，怀疑是我们偷的，派一个狗腿子，专门偷看我们厨的是啥粪。后来在我们厨的粪里拣出几个高粱籽，断定是我们偷的。地主就组织狗腿子捉拿我们，还声言要打断我们的腿。我爹愤恨地说：“地是咱给他种的，粮食是咱给他扛进去的，吃点有啥罪。咱们给他狗娘养的拚！”

逼上梁山

由于敌人的摧残，当时抗日民主政府还不可能公开活动，敌人的力量强大，胡金星扬言要抓我们，硬拚是拚不过的。黑爷、罗头爷和三个哥哥逃跑到隆尧县去了。后来，我爹不知听谁说梁山、鄆城一带年景好，要饭好要，就决定领我到那里去逃荒避难。爹对我说：“梁山是古时候水滸上英雄聚义的地方，那些英雄都是逼上梁山的。咱爷儿俩豁出两条命到梁山上闖一闖吧！咱死就死一块，活就活在一起。”当天晚上就动身了。这时大约是一九四四年夏历正月十七八。

俺爷儿俩拄着打狗棍，在黄尘扑面的大道上一步一步向前挨，一路走一路要饭吃。在路上，看见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逃荒的，要饭

的，个个面黄肌瘦，皮包骨头，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。有的走着走着就栽死在路旁，尸体没人埋，连衣裳也被扒光了。有时还碰到扔在路边的小孩，有气无力地干哭。看到这种情形，立刻就联想起卖给人贩子的弟弟、妹妹，我的心也就立刻产生一阵剧痛。我们爷儿俩目睹了人间惨景，饱受了风雨、饥饿的折磨，到二月初，才来到山东鄆城县。

原指望来鄆城、梁山，混碗饭吃，谁知降临在我们头上的是更大的灾难！

鄆城县南关是个大集市，大街小巷扯满了卖饭的大棚。有卖大饼的，卖油条的，卖胡辣汤的，卖豆沫的，卖火烧的……。坐在凉棚下吃饭的多是肥头大耳的有钱人。他们大口大口地吃着饼卷肉、油条泡豆沫、火烧夹羊肉。爹说：“在农村里要饭，地主门上有大狗，你自己不敢去要。这会儿是集市上，人多狗少，你自己要口吃的去吧！”

我伸着小黑手，在吃饭人的跟前，哼哼着，哀求着。有时候勉强要到点稀汤洗碗水喝。有时偶尔要到点饼渣，我还舍不得吃，留着给爹吃，爹还在饿着呢！

荒年穷人多，要饭的也多，饭越来越不好要了。在一个吃饭人的跟前，就伸着十几只小黑手，

哼哼着討要。那些公子、小姐、老爷、太太，一見十几只小黑手伸來，把鼻子一扭，理也不理，拿着餅到別處吃去了。要是碰到惡棍凶漢，他嫌窮孩子脏，不僅不給，還要打你一拳，踢你一脚，一個一個地都給打跑了。有時被打得鼻青臉腫。

有一次，我見一個肥頭大耳，歪戴着帽，斜披著衣裳的家伙，坐在餅鋪棚下吃餅。那家伙買了兩張餅，里面卷著肥膘大豬肉，咬一口嘴角上還直流油。我湊過去伸著小黑手討要，那家伙連理也不理，眼皮連抬也不抬，只顧耷拉著腦袋大口大口地嚼吃。我已經餓了一天沒吃口東西了，肚子里餓得咕咕直叫。等那家伙把餅吃得只剩下個餅角了，我滿以為他會把餅角給我，就朝前湊近了一步。誰知道那家伙把餅角朝地上一扔，順手朝我臉上“啪”就是一個嘴巴，還罵我說：“你這個又脏又臭的窮要飯的，湊那麼近沾污了老子的衣裳！”我又痛又恨又氣，給他講理。這一下更惹惱了那家伙，他一脚把我踢倒，猛撲過來捺住我的脖子，下死勁地掐，嘴里還罵著：“誰敢惹老子，你這小窮要飯的敢跟老子頂嘴，我今天要掐死你喂了狼狗！”當時我沒有哭，也沒有求饒，因為生活告訴了我，世界上所有的剝削階級，都是如狼似虎的狠毒，即便流出求

饒的眼泪，也不可能換取他們半点仁慈。我拚命地掙扎、反抗，用手抓他的胸，撓他的手腕子。我的指甲从未剪过，鋒利得象鋼刀，把那家伙的胸和手腕抓出了好几道血印。这一抓不要紧，那家伙兽性大发，連拳头帶脚，劈头盖脸，朝我身上、腰間，乱踢乱打。我已瘦得皮包骨头，走路直心慌，一陣风就能吹倒，哪还受得了这一頓毒打，早已昏迷过去了。

赶集的人听说打伤了个小要飯的，霎时间围上来很多人。

平时，我和爹約定，每天天黑前在关帝庙門前見面。这天爹左等右等等不見我，后来，爹听过路的人說打伤了个小孩，急忙赶来。挤进人群一看，果然是我。一家八口人死的死了，卖的卖了，只剩下我一根独苗苗了，是俺爹的命根子，又被坏人打得不省人事，哪有不伤心的！爹伏在我身上呼天喚地哭叫起来。我看看爹，听着爹哭，想把一肚子冤情哭訴給爹，但不能說話。爹哭了一阵，定了定神，抬头一看，打我的那家伙还站在旁边，双手叉腰，眯着两只賊眼奸笑。爹又气又恨，看見他眼早就紅了。就跳起来，一把抓住那家伙的領子，要跟他拚命。可是瘦弱善良的爹，哪能打得过酒足飯飽

的“虎狼”。那狗娘养的朝我爹的脸上，“啪！啪！”狠打了几巴掌，我那可怜的爹口吐鲜血倒在了地上。那家伙怪叫了一声“来人”，从饭铺里面闖出来五六个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，如狼似虎地把我爹五花大绑捆了起来。又喊了声“拉走”，七手八脚，推推拽拽，把我爹拉走了。

等我清醒过来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夜已深了，四周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影。卖饼掌柜的早已收了摊子，我爬上饼案子上躺着，焦心地等待着天明。

后来，我才打听到爹的消息，他已被捆绑着推上火车运往东北当劳工。和爹同时被抓去的，还有上千的穷兄弟。原来那个肥头大耳的家伙，是个给日本当汉奸，专门替鬼子抓劳工的。

自卖自身当学徒

失去了爹爹的照管，生活更困难了。我一个人到处流浪。

一天傍晚，我走进一个村庄，见一夥小孩围着两个补锅的小炉匠。大的十七八岁，小的十三四岁。后来我知道大的叫小炉子，小的叫小太。满脸都是锅灰，只露着白牙。我想：“能干上这活儿也能吃顿饱饭呀。”天晚了，看补锅的人都回家去了，

我把我想学补锅的心事给小炉子说了，他说他作不了主，要领我去见师傅。我问：“你不是师傅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师傅，俺俩都是徒弟，师傅在店里享福哩。”说完，他俩领我见他的师傅。

进了客店，见一个矮胖子大麻脸的人。当小炉子向他说了我想当学徒的事儿以后，他上下看了我几眼，问我叫啥名字，是哪里人，然后叫我在认师帖上按了个手印，我给他磕了个头，就算收下我了。

认师帖实际上是卖身契，上写：不论投河跳井，走失死亡，与师傅无关；只许师傅辞徒弟，不许徒弟辞师傅，不满六年辞去不干，按月退赔饭费；治病吃药，本人自理；学徒期间没有工钱。原来师傅是个小资本家，武安县人，名叫张光仁。他自己也会点手艺，但是自己不干活，专靠剥削别人过活。要是顾个大伙计还得开工钱，收留些孤儿，教上两三个月，然后一个大徒弟配上一个小徒弟就可独立出挑赚钱。

师傅对徒弟非常苛薄。每天天明出挑前，只叫吃一顿稀饭（徒弟得起五更做饭）。一天串十几个村庄，跑得腰疼腿酸，吆喝得喉干嗓哑，天黑才让吃第二顿饭。天黑回到店里还得自己做饭，做熟饭

得先让师傅吃。师傅一般是不和我们吃一锅饭的，但偶尔也吃上一两顿。他的肚子很大，他一吃，我们就得挨饿。后来，我们想出一个整治他的办法。他没有牙，在给他端小米掺豆饭时，在碗里给他放上几粒小石子，等石子把他的牙床扎破了，他生着气把碗放到地上到饭铺吃好的去了，剩下的一锅饭我们饱吃一顿。后来，这个秘密被他知道了，他就想法报复我们。一天，一个主顾要补一口十印大锅，师傅知道我长得瘦小，背不动这样大的锅，可他偏偏叫我去背。我不敢不去。大锅立起来和我一般高，锅上沿放在肩膀上，下沿碰脚跟，不能走。后来我想了个办法，在腰间撑上一根棍，把锅支起来，能走路了。谁知刚一出门，锅掉在门槛下的石头上，摔了个粉碎。师傅一听说这事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抡起板凳朝我背上、腿上一阵猛打，打得我浑身上下黑一块紫一块。这样他还不解气，又用钳子夹我的指头，火筷子烫我的头。把我折磨了个半死。四个多月的学徒生活，把我折磨得身上只剩两张皮，满脸锅底黑，只有牙齿是白的。完全不象人样。

一天，住在济宁县一个农村客店里，师傅叫我从店主人那里借一个水罐到井边提水。我人小，罐

子大，井口又滑，一不当心罐子碰在井边的石头上，碰了一道纹，我知道一定要挨顿毒打，干脆逃走吧！我怕被师傅追上了，就把罐子打碎扔在井里，把一双破鞋放在井边，作了个跳井的假象。安排妥善，我就朝西北方向跑去了。

晁老大娘

我慢慢地又流浪到了鄆城县境内。一天，我听说东溪村是个集镇地方，要饭或许好要一些，就去那里讨饭。可是身体饿得虚弱了，一上路就心慌，出虚汗。这时正是大热天，毒太阳晒得我头昏眼黑。当我挨近村边时，头一晕，眼一黑，腿一软，栽倒在地上了……

昏迷中，我觉得中指、嘴唇象蚂蜂蜇的一样热辣辣地疼了一下，又听得身边有许多人说：“动弹了，动弹了，睁开眼了！”我睁眼一看，我身边的人群中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，手拿一根纳鞋底的钢针，看到针，我越发觉得手指、嘴唇疼了。

在我完全醒了以后，才知道这位给我扎针的晁老大娘，是住在破庙里的一家穷佃户。老两口，晁大爷六十多岁了，无儿无女，孤孤独独。晁大娘见我醒来，给我端来半碗稀粥，坐在我身边，用小勺喂

我。天下穷人心连心。大娘是一位多么善良的大娘啊，她给我的温暖，只有在母亲身上才尝到过。等我能说话了，她问我的来历，我给她说了一遍，她可怜我，她哭了，说：“孩子，我有句心里话，不知讲出来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你救了我的命，有啥话你尽管说吧！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做。”大娘说：“我无儿无女，你跟我住了吧。”我正摸不到饭碗，当然同意，更何况是救命恩人呢！我说：“以后我就叫你娘吧！”

晚上，我同晁大娘、晁大伯住在一个破庙里，大娘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，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没想到半辈子了，又得了个儿子！”可是晁大爷一夜唉声叹气，心事很重。早起，大娘去集上买葱，说是要给我包饺子，大娘走后，大伯面对着我掉下泪来，我问他哭什么，他说：“孩子，不是我不愿意收留你，你想，俺老两口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，连个养老送终的人也没有，收下你多好啊，只是咱家太穷，又背了一身债，那还是你老爷爷死时，用了地主晁老三一口棺材，累了一屁股债。你爷爷给地主当了一辈子牛马，吃了一辈子猪食，没有还清债；我累出了痲病也没有还清债。俺老两口反正都老了，死了就算还清了。你要跟了我，父债子还还

要背这笔賬，子子孙孙沒个完。孩子，你还是去逃活命吧！轉轉年头，你家还許能够团圆哩！”我流着泪說：“爹，咱活就活在一起，死就死在一块，我要报答你們救命之恩。”晁大爷含着眼泪說：“孩子，不行啊！地主知道了，会把你抢走抵債的。咱不能拿着活人往虎口里送。你要心里有俺老两口子，长大了再走到这里，給俺老两口子坟上添几锹土，也就算报答了我了。”无奈何，我給大伯磕了个头，抱住老大伯哭了一陣，迈出庙門走了。

当小长工

我又流浪到鄆城县苗家庄。時間正是秋收大忙季节。开始我在一个寡妇老婆家帮工，帮她割谷子，晒場，每天掙几个窝头吃。后来人熟了，老太太借給我一个破粪筐让我去拾粪。秋天，下地的牲口多，我一天能拾三四筐，卖给富人家，能换回四个窝头吃。

村里有个破落地主名叫曾光敬，外号“鬼难拿”。这人很狡滑，最好沾小便宜。他見我一天能拾三四筐粪，早就眼紅了。一天，他找到我說：

“要飯的，你拾粪换窝头吃，飢一頓飽一頓的，不如給我当长工，活不重，拾粪、喂牛、看孩子。拾得

糞多了，年底結算時，還發給你工錢。”我想，能吃個熱湯熱飯的，比要飯強，就答應了。

曾光敬家有他老婆，還有十八歲的閨女和八歲的小眼兒子，共四口人。我每天除早起拾糞外，還得給地主老婆端尿盆，給他兒子穿衣裳。曾光敬和另一家地主合用着一個大長工，每家住半月。每當大長工輪到另一家地主家時，我還得割草、喂牛、墊圈。

到了冬天，寒風刺骨，雪花飄飛，我衣不遮體，凍得直打寒戰，不能外出拾糞。這時“鬼難拿”裝出一副慈善的面孔，把他兒子的一件破棉衣和一雙磨破鞋底的舊鞋給了我，讓我冒着嚴寒去拾糞。我一冬天沒蓋過被子，晚上鑽到牛棚的草堆里睡覺。每天晚上前半夜凍得睡不着，到了後半夜剛暖熱草窩，地主就呼喚我起來拾糞。

我就這樣給地主干了一冬天。可是年底一算賬，扣了我的衣錢、飯錢，給了我一元偽幣，只夠買兩個饅頭。

家鄉解放了

一九四五年春，一聲春雷喚醒了苗家莊的窮兄弟們。佃戶、長工等一夥窮兄弟們開始鬧增資倒佃

和減租減息的鬥爭。領導這次鬥爭的是常和我一塊拾糞的石頭大伯。他經常向我問長問短，給我講一些窮人翻身的道理。當時苗家莊村的其他幾家地主已接受了減租減息政策，只有“鬼難拿”拒不執行。一天深夜，我看見“鬼難拿”偷埋東西，還說什麼蔣介石回來先殺黑石頭。沒等天明，我就把這個消息報告給石頭大伯，他當天就發動窮兄弟鬥爭“鬼難拿”。把“鬼難拿”斗倒後，給我增加了二斗大豆的工錢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原來石頭大伯是地下黨的支部書記。一九四五年三四月間，我父親從東北逃回來，得到了我在苗家莊的消息，便來接我。至此，結束了三年多的流浪生活。三年來，我流浪過河北、河南、山東、江蘇四個省的十幾個縣，走遍了幾百個村莊，受盡了苦難的折磨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，家鄉解放了。人民政府的法律是給我們人民做主的，我們把賣給人作童養媳的姐姐要回來了。賣給山西的大姐姐聽說家鄉解放了，也來了信了。她在山西壽陽縣和一家貧農結了婚，她們也翻了身，生活過得很美滿。後來政府又幫助我找到離別二十多年的弟弟。那是一九六一年末，我寫信把我尋找弟弟一事告訴任縣縣委和縣政府。沒過一個月，縣委來信說自接到我的信

后，县里就馬上派人到各个村庄調查我弟弟的下落，終於在南榴砦大队找到了我的弟弟。他已认貧农刘寬作义子，現任生产队队长，改名刘粉江。我那时在天津工作，听到我弟弟有了下落，心里多么高兴啊！学校党委知道后，給我一个月假，让我回去見六岁上就离別了的弟弟。

我到了任县南榴砦村，党支部书记領一个青年人來見我。他是个五尺高的汉子，身穿小大衣，留着分头，沒想到他就是我的弟弟！我記憶中的弟弟是个皮包骨头的孩子，他是被人販子用驴馱走的。

我弟弟也不敢认我了。我給他讲起小时候能記起的事，如讲母亲的死；讲拾麦时地主羔子打他，我阻拦，地主羔子把我踢倒在麦茬地上，把嘴巴頰上扎了个口子，至今落下个疤。我叫他一看伤疤，弟弟脸色变了。当我說出他肚子上也有一块伤疤时，他哭了，喊了我一声哥哥，掉下泪來。

解放后，我們全家得到了团圆。經過土地改革，我們在經濟上、政治上都翻了身。土改时分了三間房屋的木料和八千多块砖，在农民弟兄們的帮助下盖了三間新房。还分了十六亩好地及应用的农具。后来，我家积极地参加了互助組、初級社、高級社、人民公社，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。我們全

家得到党和群众的信任。我爹从减租减息时就是贫农团的代表，土改时是平分委员会委员，人民公社成立后，又当队里的保管员。我弟弟担任生产队长，我两个姐姐都是贫农下中农代表。穷人真正当了家作了主。

党把我培养成大学生

土改后，党把我送进学校，从一九四七年入小学一直培养到一九五九年我大学毕业。我有一点文化，完全是党给我的。在学校的时候，组织上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，从生活到学习，都加以照顾，鼓舞，帮助我克服困难。特别是在政治上，党经常教育我，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，一九五八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当我向党宣誓的时候，我想到了旧社会逼死了我的爷爷、母亲，饿死了三弟，是党给了我今天的幸福生活。旧社会逼得我全家骨肉分离，我们姊妹五人都被卖过，爹也被抓去当劳工，是党是新社会使我们全家团圆。旧社会逼得我沿街乞讨，到处流浪，无家可归，过着非人的生活，是党把我从地狱中解放出来，并培养我上了大学，当了国家干部。若不是党救我，我别说当上新闻记者，早就饿死在



道旁路边了。若不是解放，我們全家早就被折磨死了，根本談不上團圓。

旧社会的苦楚，好比长江水，永远訴不完；党的恩情重如山，永远不能忘。我宣誓：我永远不能忘記階級压迫，永远不能忘記階級斗争，永远不能忘記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。我要用全部精力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，并为解放全人类貢獻自己的毕生力量，为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沒有階級压迫、沒有階級剝削的人类最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到底！

童年血泪

郑子和

我今年三十三岁了。这三十三个头是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度过的。前十八年是在黑暗的旧社会熬过来的，后十五年是共产党救了我以后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。一提起旧社会，我就恨得牙根发麻，不由得回想起我苦难的童年，也想起了我一家悲惨的遭遇。

逃往天津去謀生

从我懂事的时候起，家里就没有一亩地，只有三间见雨就漏的破草房。那时节，父亲常年给地主扛活打短，全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。后来父亲利用给地主干活的休息时间，一镐一镐地开了一亩半荒地，种点高粱什么的，这就是全家仅有的一点地。一九三九年闹大水，我才八岁，那年洪水来势凶猛，我家的三间破草房一见水就倒塌了。为了逃活命，父亲带着我母亲、哥哥、妹妹和我，由静海逃往天津去謀生。

我們到天津后，想找到亲戚家去住，誰知道亲戚家却不肯收留。父亲是个硬汉子，一賭气，就带着我們离开亲戚家，过起討飯流浪的生活。夜間露宿街头，白天沿街乞討。母亲带着我們哥仨，东一家，西一家地要飯，碰好了，一天能吃个半飽，碰不好，全家都挨餓。我那四岁的妹妹，一天吃不上东西，就伸出小手嚷着要吃的，总是嚷得母亲泪珠滾滾。有什么法子，只有这样一天挨过一天。我們沒吃少穿，个个瘦得皮包骨。后来还是母亲再三向亲戚家央求，借来一点錢，让父亲做个卖炸糕的小买卖，經過四处求情，租了一間房子，一家人才勉强地安頓下来了。

父亲被日寇打死

吃的能凑合，時間就过得快，轉眼就过了三年。生意刚能維持我們全家的最低生活，可是灾祸又降到头上来了。

一天，父亲正在馬路上卖炸糕，迎面闖来一群日本鬼子兵，还跟着一个汉奸翻譯。他們一到父亲的摊前，伸手就吃炸糕，不一会，炸糕吃光了，扭头就走。父亲赶上前去，求他們留下錢，鬼子兵却张开兽嘴哈哈大笑起来。父亲只好去央求汉奸翻譯

說：“先生，我这是小本生意，全家都依靠这点糊口，請你行个方便吧！”

狗汉奸冷笑着說：“大日本皇軍到哪里吃东西也不能要錢。”

“大日本皇軍也得讲理呀！”父亲气愤不过，就反問一句。

“讲理？”这下子可恼了狗汉奸，他說：“我送你个地方讲理去吧！”

炸糕錢沒有給，父亲被送进监牢。他惨遭了吊打、灌辣椒水等多种酷刑拷打，有一次还被抬去“陪綁”，硬逼父亲招认私通八路軍。母亲听到消息后，憤恨加上悲痛，癱軟在地上，我們都跟着她哭。可是哭頂什么用，母亲只好又鎮靜下来，到处煩人借錢上下打点衙門，才把父亲救出来。但是，父亲出獄时，已經不能走动了。

父亲回到家，躺在炕上，痛恨鬼子，咒罵汉奸，天天嚷着等他病好，还要到衙門去讲理，去上告。可是他自己不久也明白过来，在那个时候，是鬼子汉奸当权，哪还有穷人說理的地方。慢慢地他又改变了主意，嚷着等病好了，就磨一把快刀去杀鬼子汉奸。可是，時間过了三个月，父亲因为受刑过重，气愤填膺，怒火攻心，病势越来越沉重了。母

亲把平时卖炸糕积蓄的一点錢都花尽了，吃的药全沒效。一天，父亲把我和哥哥叫到身边，伸出干瘦的手拉住我們小哥俩說：“爹不行了，今后的日子靠你們过吧！要好好听你媽的話。千万記住要給爹报仇。”并叫我們当面就答应給他报仇。他看到我們哥俩点头，脸上浮起一絲微笑，就断气了。

父亲一死，全家便沒了主心骨，媽媽只哭得死去活来。可是父亲的尸体未凉，棺材还沒着落，要賬的就找上門来，房主也嚷着往外撵。在万恶的旧社会里，真是沒有穷人的活路，母亲眼泪哭干了，也想不出办法。母子四人还在痛哭的时候，从門外走进来一个中年妇女，她凑到母亲耳边悄悄地說了几句話，起初母亲是摇头，后来又点头答应了。那女人走后，母亲就把妹妹叫到跟前說：“孩子，媽对不住你，为了还賬，为了給你爹买口棺材，娘把你卖——”卖字还沒出口，妹妹哇地一声哭了，扑在母亲怀里，哭喊着：“媽媽可別卖我，我离不开媽媽。”我們全家人都痛哭起来，直到媽媽答应不卖妹妹，我們才止住哭。天已經黑了，我們只得餓着肚子去睡覺，妹妹怕卖掉，睡着了，小手还紧紧扯着母亲的衣襟。但是，等我們醒来，妹妹不見了，母亲趁我們睡熟的时候，把刚刚七岁的妹妹抱

走卖掉了。

过起了乞丐生活

埋葬父亲的第二天，全家就被房主赶出来。母亲用卖妹妹剩下的两块錢买了两領席，到“三不管”（現在的天津南市，在旧社会叫“三不管”）去搭窝棚。刚搭好，伪房产局就来收盖窝棚的地皮捐。說是要交不出錢就得把窝棚拔了。母亲只得又卖掉父亲生前的衣服，上了地皮捐。住的凑合了，吃的可再也沒法子可想了。母亲又去托人賴臉，把哥哥送进了一家工厂，她自己給人家洗衣服，我就守着“家”。母亲一天拚命干也掙不了两三角，只能买些豆腐渣、糠麸子等，娘俩勉强度日。時間长了，母亲身体漸漸弱了，双手又成天泡在水里，起初是紅肿，后来被磨破的地方就潰烂了。可是为了生活，母亲照样坚持着。每等媽回家来，我就拉着她那潰烂的手，心疼得叫她不要再去，媽总是回答說：“傻孩子，我不去洗，咱又吃什么呢？”

一九四二年春天，物价一天三涨，靠母亲洗衣服掙的一点錢維持生活，无論如何也过不下去。不得已，母亲又托人把我送到白鉄业厂当了徒工。名义上是当徒工，实际上是去伺候东家的一家老小。成

天端尿盆、生炉子、扫地、抱孩子，有什么杂事做什么。有时一件事没做好，就遭到训斥和辱骂。为了能吃上一顿饱饭，我只好挨下去。有一次，老板叫我搬一百斤重的白铁，我那年才十一岁，哪里搬得动，一不小心，碰了老板的脚，这可闯下了大祸。他把我抓起来，扔到马路上，接着就是拳打脚踢，直把我打个半死。夜间苏醒过来，我发现自己还躺在库房的地上，伤口一阵阵痛得我咬牙。我前思后想，觉得这里实在呆不下去了，就偷偷跑出来。可是到哪里去？回家吗？要连累母亲。我只好一个人到处流浪。从此我在市内的街道上过起了乞丐生活。要来了吃一口，要不来饿着，渴了跑到河边喝两口，夜间蹲在背风的墙脚边打打盹，褂子破得实在穿不成了，索性扔掉光着膀子，裤腿被狗撕破了，就向上卷，一直卷到大腿上。就这样生活着，又熬了三个月。

我过的三个月，虽然受罪不小，但是和母亲比起来，还算好过。她老人家这三个月是在精神上受尽折磨，生活上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活过来的，真是度日如年。我走的第二天，老板就派人来找我母亲要人。母亲听说我没有了，又吃惊又伤心。可是来人不管有没人，先向我母亲要七个月我吃的饭钱。母亲哪里有钱，只好跪下来求情，最后保证把我找到

送回厂里。打发来的人走后，母亲一连两天两夜没吃饭没合眼。她哪里能经受得住丧夫失子的打击，渐渐地精神失常了。每天疯疯颠颠，跑到街上，逢人就打听，见到和我年龄相貌相仿的就叫“子和”。有一次，她跑到南市一条街上去喊，正碰到我在墙脚捡破烂，我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正是母亲。可是才三个月，母亲完全变了。她披头散发，两眼失神，面色焦黄，张着双手，脚步凌乱。我连忙赶过去，扶住母亲。这时母亲捧着我的头，两眼呆呆地对我看了又看，还问：“你是谁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子和。妈，你怎么啦？”她还是摇头说：“你不是子和，我儿比你胖，他早不在。”我见母亲不相信，就一五一十地说起过去家里的事，渐渐地她清醒过来。又把我仔细打量一番，才抱住我失声痛哭起来。她说：“儿呀！娘为你三个月吃不下，睡不着。想到你爹死了，你也没了，我在世上还有什么活头。几次想死，可是又舍不得你哥哥，还想着你没下落，希望有一天能找到你。我就一天一天到街上喊你。今天喊不到等明天再喊。娘现在总算把你找到了，快跟娘回家吧！”半路上，她打量着我皮包着骨头的身体和被狗咬烂的腿，眼泪又滚了下来。找到了我，她精神上也有所安慰。

亲娘被迫改嫁

母亲找到了我，稍稍宽了心，可是添了一张嘴，又是件愁事。一九四三年，她又奔跑着托人把我送到一家鲜货店里去当学徒。当时鲜货店规定：“学徒打死无论，中途不干要退饭费，如果逃跑要由保人赔偿损失。”这是何等恶毒的规定。但是为了减少母亲的生活负担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干。这次母亲一再嘱咐我，无论如何也要干下去。到了鲜货店，简直比在白铁厂还受罪，一天到晚累弯了腰，夜里熬到十二点才吃上饭，还不管饱。我在这里呆下去的信心又动摇了。

再说母亲，她把我送走以后，一个人呆在窝棚里，想起了几年来家庭悲惨的遭遇，也想起了被卖掉的妹妹，不知她近来怎么样。一次她托人去看妹妹，那人回来告诉她，妹妹天天给人家推磨轧碾子，挑水做饭，过度的劳累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子了。母亲听了，象刀子绞心一样心痛。她不忍心让亲生骨肉这样活活被折磨死，她要把孩子从火坑里救出来，可是孩子是卖出去的，要赎回来就得花钱，钱从哪里来呢？她左思右想，毫无办法，就跑来找我商量，我听说妹妹在受苦也很难过，可是我

这个苦学徒的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只好劝母亲慢慢再說。不久，母亲又来了，她手里拿着妹妹小时候穿的一件破褂子，两眼发直。我連忙走过去刚要說話，这时二老板走來說：“你們要說話快出去說，別扰乱买卖。”我和母亲来到街上，母亲对我說，她想了个救妹妹的法子。我听了很惊喜，忙問什么法子。母亲摇头說：“孩子，这你就別多問了。”她說着就走了。我回到店里，对母亲說的法子老猜不透，越想越不放心。第二天我向老板請了半天假，回到窩棚，进門刚要喊媽媽，里面走出个陌生妇女，我一楞，忙問母亲的下落，她回答說：“从昨天回来就走了。”“走？她到哪里去了呢？”我头昏眼花地走出了窩棚，又向熟人打听，他們都說不知道。我又跑到哥哥那里，他說母亲沒来过。我們哥俩見母亲沒了，急得沒法。看看天色又晚了，我只好无精打采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鮮貨店。

父亲死了，妹妹卖了，母亲沒了，哥俩当时心里的难受就甯提了。怎么灾祸偏偏只落到我們一家头上啊！怎么穷人命就这么苦呢？从此，我夜間睡不着，白天也沒劲，这就遭到老板更多的毒打和謾罵。好容易过了七天，突然母亲来到鮮貨店。她向我招手，我跑到街上一看，哥哥来了，妹妹也来

了。我喜出望外，拉住妹妹問長問短，又問母親到哪裡去了。母親從懷裡拿出大餅給我們吃。我很納悶，問她哪來的錢？她光是哽咽答不上來，後來索性放聲大哭了。我們哥仨更摸不清是怎么回事。母親一邊流淚一邊斷斷續續地說：“孩子們——為了搭救你們受罪的妹子，媽媽想不出好辦法，我只好改——改嫁啦——要了人家六十塊錢，才把你妹妹贖回來。”我們聽說母親嫁了人，先是驚慌，後來都哭了，拉着母親不叫她走。妹妹哭得更淒慘，她非要自己回去不可，把錢退回來讓母親留下。母親說：“我已經給人家畫了押，孩子們，不走是不行的。我走以後，你們哥倆要注意身體，往後咱母子見面的機會不多了。”我們听了更是哭得厲害。這時，遠處來了一個人把母親和妹妹拉走了。從那以後，我再也沒見到我日夜想念的母親了。

終於盼來紅太陽

一九四四年秋季，我在鮮貨店被折磨得說什麼也呆不下去了，就向老板提出不干了。老板把臉一沉說：“好！咱是有言在先，你不干了，可得給我兩年的飯錢。”他看我拿不出錢來，就扣下了母親臨走時留給我的那條半舊的棉褥，冬天快到了，我

怎么办呢？我把牙一咬，提起剩下的那条破棉被回靜海了。坐火車沒錢，我只好把破棉被賣了三塊錢做車費。回到老家也是沒法，家沒家，業沒業，舉目無親。我望了望原來被水沖塌的破房地基，一狠心，找了根棍子，就到鄉下又過着討要的生活。我順着城東走，經過大寨，到了董莊窠。董莊窠一家地主認為收下我可以替他家喂牲口，不給工錢，是便宜事。于是就問我：“喂！小要飯的，你給我喂牲口，管你吃飯，你干不干？”我餓得沒法，只好干吧。誰知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地主的心腸跟資本家一樣毒。他家的糧食多得沒處放，可是，我們這班扛活的吃的是粗糠加野菜。這樣過了兩年，地主又從我身上打新算盤了，不叫我喂牲口了，叫我和成年人一樣下地干活，但是還是只管飯，不給工錢。我這十五六歲的孩子，白天干一天活，晚上還要挑兩缸水，動不動地主又打又罵。就在這個牛馬不如的日子里，我又熬過了三年。當時我想，這個黑暗的社會什麼時候才完呀？窮人什麼時候才不受罪？
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終於盼來了共產黨，我這苦難才算熬出了頭。一九四七年秋，在黨的領導下，我們這些扛長活的經常在一起開會，接受黨的教。從此我懂得不少革命道理，開始認識到不推翻

黑暗的旧社会，穷人永远沒个好日子过。于是我参加了游击队，斗地主，分田地，和敌人展开了拚死拚活的斗争。一直到解放，我重新返回了静海，分了房子和土地，建立了家庭。现在我已经有五个孩子，全家日子过得乐哈哈的。

一九六三年秋，静海遭受到比一九三九年还大的水灾。但是时代变了，我们一家人和全县人民一道，在水还没到之前，就安全地转移到兄弟村，并受到兄弟村群众的热情招待。灾后，党和政府对我們更是关心备至，拨下来大批救济款物。全国各兄弟省、市的人民拿出大量的东西来支援。我們这里虽然受灾很大，但是，大家都挺好。我经历过两次水灾，得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。这深深地告诉我，永远不能忘记那万恶的旧社会，永远不能忘记过去的阶级苦，永远要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，热爱社会主义社会，用加倍的努力，十足的劲头，积极地参加集体劳动，多打粮食，支援国家建设。

朱延龄 整理